

寻找方大曾:致敬理想的心路历程

□张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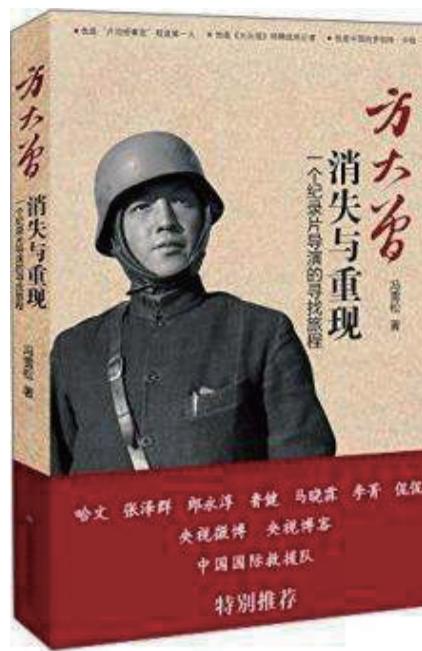
我与冯雪松第一次见面是在2017年的夏天,这也是我们至今惟一的一次见面。在这之后,我陆续收到冯雪松寄来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这两本书都采用了以“事实”和“亲历”为特征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并冠有“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的相同副题,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人性姿态,以写作主体的视角直接描绘追寻的人物和自己的观察思考。当我把前几年的“解读”和这两本“寻找”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的阅读后,不仅更加明晰了冯雪松寻找的轨迹,还感觉出他与一般的非虚构类文学写作略有不同,就是在深度介入的理性分析中多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从开始对方大曾散落的作品进行集中整理展示,为不同时代的新闻人搭设穿越与对话的平台,到后来着重探寻方大曾的人生和新闻之路继而“两路”交汇的精神轨迹,其“角色”已明显进入深度融合的境界。他不再感到距离的遥远,好像看见了小方“为世人留下了关于理想和信念的灯塔”,似有一个声音在远方召唤,引导他一步步走进小方的世界,完全停不下来自己的脚步,十八个春秋冬夏从未间断,使他在“重拾”“重现”小方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灵魂的重塑,这让我们不能不去重新认识这位执著的冯雪松。

谁都会以为他的寻找之路是轻松而顺畅的,因为有国家级媒体的耀眼光环,寻找的区域又大都在华北,即使遇到一点困难也不算什么,但世俗的观念却是他在寻找路上跨越的第一道障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新闻史上没有小方的一席之地,抗日救亡的英雄碑上也没有小方的名字,他只是大洪流中的一个进步青年,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是一个“业余记者”。但冯雪松没有被“名分”遮眼,更没有为功利忧心,而是凭借他的职业眼光透过历史,看到了那个被岁月尘埃包裹已久的有志青年,是一个奔走在抗日前线、不惧怕牺牲的勇士,是一个与劳苦大众为伍、敢于揭露黑暗真相的志士,还是一个有着顽强意志和强健体魄,随时挑战恶劣自然环境的斗士。这为冯雪松后来的寻找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前期有履职的任务驱使,但逐步转化为从敬意到敬仰的情不自禁,“为内心的寄托而寻找,为民族与国家的记忆而寻找”,到后来主导整个寻找过程的已是思想和情感的力量了。

惟其真实才能感人,这不仅是新闻的基本准则,也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但在不少非虚构类的文学写作中,违背或解构历史的真实,扭曲和亵渎艺术的真实,任意对笔下的人物情节添油加醋甚至弄虚作假,效果适得其反,不仅伤害了被描写的对象,也败坏了作者作品

的声誉。冯雪松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为世俗动机而走任何“捷径”,明确选择了一条在他看来充满艰辛却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寻找之路。首先要面对的是,小方的生命轮廓是破碎的,遗存的作品是散碎的,再加上他的业余时间是零碎的,而要在短时间内重新连缀方大曾的生命样貌将是何其困难。但在冯雪松看来,“三重碎片”是他的痛点、难点,也是他的起点,方大曾如被遗忘那是民族的悲剧,方大曾的“重现”若被“注水”则是我们后辈的耻辱,“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拨开那些若有若无的尘埃,挽回那缕若隐若现的荣光”。冯雪松就此踏上了寻找的长路,就像方大曾追求真相一样对待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那些散佚的历史碎片作尽可能细致准确的考证,一点一滴地把这些碎片完整拼接起来,包括小方的家庭和主要成员,成长中的阶段特征、重要经历,与其交往较多的人物和交往很少却不同寻常的人物以及他们共同的故事,拍摄每一幅照片或撰写每一篇文章的时代背景、现场环境、与之相关联的人和事及社会现实,都要一个个、一幅幅、一篇篇地追根溯源,多次沿着小方走过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不人云亦云,不将信将疑,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历史和人物有价值有意义的细节,鉴别真伪,去伪存真,由此及彼,发掘出蕴藏的思想内涵和文献价值,而且要经几个方面论证无疑之后方能确认。这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也是严肃严谨的文学态度,反映出冯雪松尊重并敬畏历史和艺术的情怀,也只有具备这种情怀才能使他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在不断深化的艺术实践中与寻找的历史人物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不仅是居庸关长城隆隆的炮响、卢沟桥头激烈的枪声和抗日将士们血肉横飞的悲壮惨烈,更多的是方大曾用镜头记录下的那些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场景。当方大曾这个名字重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是带着战场的硝烟和英雄的花环向我们走来的,自然被冠以“战地记者”的称号,这个荣誉对小方来说当之无愧,仅此就可以万古留芳。但是,冯雪松的寻找,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为多数人不了解也更为全面和完整的方大曾,让我们看到他小小少年的内心激荡着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热爱,尤其是对那些在社会底层被剥削压榨和侮辱的工人农民表现出的良知、情感和愤慨不平。正因为有这样的大情怀,才使小方不小,与众不同,没有安于富足生活的养尊处优,也没有留在象牙塔里继续攀升,而是挣脱了传统的束缚,投身于时代的大洪流。面对黄河滩上一个个皮包骨头的纤夫和船工,倾听深山里那些种鸦片、抽大烟的挑水工的对话,打量



那些满脸黑灰拖儿带女在窑洞挖煤背煤的父母,还有那些衣衫褴褛流落异乡的逃荒流民和乞丐,并没有太多的惊心动魄,却捕捉到了让人揪心的细微之处,让我们一次次为这些苦难场景中的苦难景象产生的视觉冲击力而震撼,一次次被这些看似冷酷却又包含着人性体温和人文道义情怀的图片所感动。如果说方大曾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来的满腔仇恨,正是源于他对自己同胞最真挚和深沉的爱,才一次次奔赴前线大义凛然,那么冯雪松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完成对一个人寻找的同时完成了“重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表情,在揭示小方身上所代表的新颖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职业精神过程中还实现了对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驱们整体形象的本真“重现”。

“重现”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和叠印,更是冯雪松与方大曾心灵的对应和契合。这主要表现在对小方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深入梳理,让近千幅珍贵的历史底片在现实之光的作用下将原有的潜影重新显影、定影,从而凸显出方大曾为了崇高的新闻理想矢志不渝奋斗不止的清晰影像。这使我想起了写实主义摄影学派的大师布勒松的名言,“在拍摄的时候,我总是睁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整个世界。我又总是闭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自己的心灵。”小方的新闻实践,一直都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外部世界又观察自己的心灵,并在这种双重观察叠加思考中实现思想和艺术的融合升华。从行走路线来看,无论是穷乡僻壤、荒原大漠,还是江汉河滩、深山古刹,或是街头巷尾、市井百态,小方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向人民大众,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报道题材来看,没

有世外桃源的湖光水色,也没有闲情逸致的花鸟虫鱼,一直用目光盯着病人膏肓的社会,让镜头聚焦社会现实热点,从不作为个人谋生的工具,而是作为揭示社会问题的叙述手段,把报道事实真相作为唯一遵循的准则。从实现价值来看,不为猎奇赚人眼球,不为报酬赚钱发财,也不为个人沽名钓誉,而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精神诉求,凡是对于民生改善和社会公平正义有益的事就认真去做,凡是关系国家安危和民族生存的事就视为至高利益,无条件为之奋斗直至献出生命。可以说,这也正是冯雪松寻找的艰辛不易和成功所在,一方面把人们过去对小方零散的、模糊的甚至是未知的认识作更为系统、清晰和明确的梳理,一方面把小方的所作所为从以往只是停留在对摄影技巧和报道题材的单纯评价,转变为用历史和时代的眼光以及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标尺进行综合考证测量,多侧面全方位向我们论证并展示了方大曾之所以称得上是“中国的卡帕”,是因为他有着与卡帕一样的新闻理想和为实现这个理想所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

小方的出现是神奇的但不是偶然的,他的生命虽然短暂,精神却得以永恒。这也可以说是冯雪松最大的贡献,18年持续不断的寻找,使曾被历史遗忘的小方终于得以复活。这也说明方大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是用常规的年轮可以计算的,那些在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不仅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烙印,而且还有历史的超越性,尤其当他不朽的生命被赋予时代的脉搏之后,小方精神就被重新激活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同频共振。当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新闻人推崇敬仰方大曾,我们越走近小方,认识小方,就越感觉到与他之间的差距,“我们不缺少信息,却缺少真正的新闻,我们也不缺少融媒体时代的新技术手段,却缺少直抵本质的理性洞察”。更有许许多多追随小方足迹的有识之士,对现在一些摄影人过度注重个人的感受,出发点往往是即兴、模糊和臆测的,而较少考虑建立个人与社会发展进程的更加直接的关系,社会现实作为影像背景越来越淡化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他们发出呼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一个好的摄影记者的价值在于,能用最好的照片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用自己的观察、见识和情怀带人们走出视野的盲区。令人欣慰的是,一个从情感到理智的认同正在我们的队伍中发出嘹亮的声音,我们追寻小方、怀念小方、致敬小方,其实就是致敬我们的新闻理想。

我以为,这就是冯雪松寻找方大曾的初心,也是对一个纪录片导演为新闻、为文学艰辛付出的丰厚回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读到吴万群的长篇小说《潮涌灌江》确实让人感慨万千。

作品反映的是一个特殊行业的改革历程,这就是色纺纱工业。对中国的纺织工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同样走过了一条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道路。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地方的纺织工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特别是像作者所处的苏北、苏中产棉区。但是几年之后,过剩的产能、粗放的结构、落后的工艺、单一的品种、市场的竞争、国外同行的冲击,使得大部分纺织工业难以继续。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的纺织人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时势造英雄,如同作品的主人公相铁峰一样,很多改革型企业家审时度势,勇立潮头,完成了企业的升级转型。这一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面临的远远不止前述的行业的困难,他们首先面临的是自己理念上的革命,是体制上的诸多障碍,是传统的巨大的塑性和复杂的人性世界。《潮涌灌江》也正是在这些层面上展开矛盾冲突的。相铁峰必须战胜一个个的困难和挑战。凭借作品设计的挑战,吴万群为我们塑造了不同的人物群像,有像相铁峰、秦大帅、王晓璐、华珍这样的改革群体,有像汪白这样名义上支持改革,实际上唯利是图的腐败官员,有像毕德昌、刘棒这样的社会黑恶势力,也有像朱钢洋、施胜这些企业内部的堕落分子……正是这些不同层面人物的活动与较量,构成了作品尖锐的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从一般的作品分类来看,《潮涌灌江》属于主旋律作品。这部作品运用了作者多年的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与艺术思考,作者数易其稿,使得这部改革的“正剧”具有了较好的艺术性和可读性。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就可以想象作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支撑起了作品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故事情节的设计和安排至关重要,否则,不但吸引不了读者,而且无法构成作品长时段的叙事行为。比如,作品中的许多情节都是故事套故事的,是随着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变化而次第展开的,作品有几条并列的主线,在线主线上又隐藏着副线,许多线索有断有续,又前后照应。作品中反派人物的戏份,如毕德昌就是一个看点,汪白也是一个可以深度分析的人物。这样的人物设计与矛盾冲突会不会影响作品主旋律的亮度和成色?这是许多同类型作家感到为难的地方,也是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颇费踌躇的所在。事实上,这也的确在度的把握上存在难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难度就放弃矛盾冲突,把改革开放写得一马平川,歌舞升平,这就不是一个艺术处理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真实的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说到底,主旋律的内涵不是作品层面的,而是社会现实层面的,它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中主要矛盾的反映,因此必须忠于生活。如同经典美学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容始终是衡量作品真实性与艺术价值的第一尺度。如果再展开来说,我们的一些作品之所以在创作上畏葸不前,缺乏艺术的勇气,关键是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足,是创作积累不足,是思想认识未能跟上时代的节拍,更缺乏对社会历史的穿透力和洞察力。在这个方面,我对吴万群这样的作家非常佩服,也十分信任。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基层,一刻也没有脱离社会,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起码是近距离的在场者,是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说起这几十年的历史,他们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真实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艺术的想象有时真的赶不上他们笔记本上的素材。他们知道人民群众在想什么,他们知道改革的每一步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怎么写改革开放,他们有信心,有底气。他们知道改革开放就是攻坚克难,要付出智慧、心血、成本,甚至生命。所以,《潮涌灌江》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真实地呈现出生活中存在的暗流、阻力,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影响作品的正气和鼓舞人心的力量,相反,却引发了读者对生活的热爱,对改革者的钦佩和投身改革的豪情。

再一个就是主旋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潮涌灌江》之所以成功,也在乎作者没有只把眼光盯在社会的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把人物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将人物置于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呈现出生活的底色,正视人物的七情六欲。事实上,作品中的许多矛盾冲突正是起于人物的欲望。这方面,作品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是相当成功的,华珍、王晓璐、桃红、肖丽和肖青姐妹等都写得个性鲜明、活色生香,而相铁峰与几个女性感情上的纠葛更是写得曲折缠绵,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心路历程,不同的结局安排确实比较抓人。显然,吴万群对如何把握主旋律题材的创作是下了功夫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改革开放的真诚热爱和全面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改变几乎是所有领域的,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它首先是生活的,是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是心理感受和社会面貌。对于文学来说,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后者,是生动的生活,甚至是日常的细节。对这些具体生活的描写不但不会削弱改革开放宏大主题的表现,反而会使之血肉丰满、真实可感。所以,我认为,《潮涌灌江》的成功对吴万群来说不是一部作品的成功,而是对他如何写好现实题材,如何表现改革开放这一写作领域的成功探索,这些经验非常宝贵,值得特别说出来让同行们分享和思考。

吴万群将塑造人物形象作为作品的根本。当年高尔基曾经与青年作家讨论过如何写好工厂,高尔基坚持一点,即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应该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不能因为机器忘了人物,不能为了技术的描写而忽视了人性的探究。在这方面,我们欣慰地看到,《潮涌灌江》塑造了一群新的现代“企业人”的形象,他们是“新人”,是当代文学画廊中的新形象。特别是以相铁峰为首的正面形象其意义值得重视,因为对当下日益企业化生存的中国社会来说,尤其需要有正面的形象来引领。在当今世界几乎是社会管理与企业运营两分天下的时候,企业的精神、价值取向,“企业人”的人格以及整体的素质关系到广大的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与社会的文明程度相关,因此,塑造承载正面价值观的形象就显得非常重要。

吴万群非常注重形象、情感,注意开发现代企业的审美体验,发现现代企业之美,注重创造和发现现代工业的美与诗意。彩虹集团、色纺工业在作品中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是新的空间、新的时间,新的色彩、新的线条,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情感天地。特别是现代企业提供新的叙事方式、叙事材料、功能元素与小说结构使作品具有了新的文学气质。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潮涌灌江》作为企业文学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企业当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企业化的社会之中。文学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意义范畴、叙事伦理和诗意空间。当人们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时,就必然要有新文学话语。文学不仅是对既有价值的复述,它还应该参与到价值的创造与传播中。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学一直是人类价值重要的创造者之一,在当今和未来企业化社会中,它应该主动地提供新的经验,企业文学将会是文学的重要门类,并且将在社会生活中承载企业化生存的文化担当。

文学世界最迷人的地方,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同的自我完成方式。陈彦先生凭借丰厚的生活积累,近年来连续推出现实题材长篇小说《装台》《主角》,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忆秦娥、刁顺子等新的典型文学人物形象。从忆秦娥、刁顺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人生的不完满和人性的完美。

《装台》是为小人物立传,写了主人公刁顺子不到一年的生活,而这一年也是刁顺子一生的写照。“顺子”在日常生活中诸多不顺,整个人生就是一出悲情戏。他本人因为装台,“几个指头短粗粗的,茧子一层摞一层,冻疮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他的四任妻子,或跟人跑了,或生病致死,或情投意合却不得不离开,或不期而遇而不可推脱,他的三个女儿,或年长未嫁脾气暴戾,或一时冲动嫁给农村同学,或小时候被火烫了毁容。还有他那因赌博负债累累病死的大哥,等等,诸事不顺。面对艰辛生活,顺子“顺从”“逆来顺受”,他的口头语是“咱就是个下苦的”。这种无奈、安身立命、安之若素,如同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我们看到了顺子的现在,同时也看到了顺子的过去和未来。

也许,《装台》是人生的深秋和冬天,偶有冬日暖阳,但更多的是肃杀、萧条景象。不过在这无奈的轮回中,依然透给我们春天的希望。生活艰辛,诸事不顺,顺子也会偶起匹夫之怒,但绝大多数时

候,他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理解。这颇有点像佛家说的“忍辱”。顺子对待装台的兄弟们真心实意、处处维护,对待赌徒、病危的大哥精心照料,对待残忍、刁钻古怪的大女儿般呵护,对待退休多年的老师常年看望,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还有,顺子的第三任妻子贤惠知礼,深明大义。这正是人性的美好。尽管人生多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可是依然可以想象“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人性是永远向往和追求美好的。

装台是舞台的“背面”生活,主角是舞台上的辉煌敞亮。《主角》写了一个放羊娃、烧火丫头忆秦娥成长为一代名角40年的舞台生涯。同顺子一样,忆秦娥的家庭和情感也是千疮百孔。两任丈夫先后离她而去,痴呆的孩子意外摔死,照顾生病的前夫,等等,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忆秦娥在事业上也是备受艰辛,“演戏真的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太太太大了。下辈子要是允许她选择,她一定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她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再唱戏了”。如果说刁顺子“忍辱”,那么忆秦娥就是“精进”。人生的本质是时间。40年的摸爬滚打、精益求精成就了忆秦娥,她从“捂着嘴傻笑”的小姑娘成为主角,尽管有着种种外在机缘,但她的身上不可遏止地充满了生机。这种积极向上的内生力量,这种真诚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使她不断成长。修辞立其诚,天道无欺,天道不二。大自然如此,写文章如此,做人的根本也是如此,也是这个“诚”“无欺”“不二”。一个人的好坏不是去和别人比较,而是看你是否尽了自己的全力。“戏比天大”,“观众的鼓掌就是要你的命”,“主角就是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忆秦娥在艺术追求上是尽了自己的全力,做到了极致。没有对事业的专注,没有这种生命的投入,没有这种意志、精神、理想,忆秦娥成不了主角。忆秦娥的苦难、宽恕与坚持,诠释出永不泯灭的人性。

人生的不完满是永远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凡人,都生活在平凡的世界。每个人的职业、身份、层级不同,而同归于“装台”;每个个体尽管渺小,各有各的人生遭遇,而同时又是“主角”。在装台方面,顺子就是“主角”。他领着十几个兄弟干活,那些人离了他还就是不行。就连《主角》中也提到,“好多布景道具,依然是请刁顺子团队承包制作

